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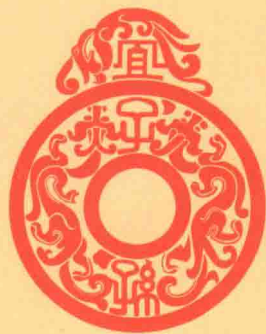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杜牧集系年校注

[唐] 杜 牧 撰

吴在庆 校注



中 华 书 局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杜牧集系年校注

〔唐〕杜 牧 撰

吴在庆 校注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牧集系年校注/(唐)杜牧撰;吴在庆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1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09025-3

I. 杜… II. ①杜…②吴… III. ①唐诗-诗集②
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唐代 IV. I214.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860 号

-
- 书 名 杜牧集系年校注
撰 者 [唐]杜 牧
校 注 者 吴在庆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1 插页 2 字数 660 千字
-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025-3
定 价 78.00 元
-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多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

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前 言

“小杜文章天地并”(王崇《池州府志》卷八宋邦辅《登齐山怡亭》诗),这是前人对杜牧诗文的赞誉。获得这一盛誉,乃在于如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中所称赞他的“真色真韵,殆欲吞吐中晚千万篇”。杜牧获得如此盛誉,故历代以来其诗赋脍炙人口,他的《樊川文集》是人们所最喜爱的晚唐文集之一,而古典文学界对于他的研究一直盛而不衰。

一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〇三),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中唐著名宰相、撰有《通典》二百卷的杜佑之孙。杜牧自小深受祖父影响,承继杜佑的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均颇关注,揣摩研究,故少小即怀经邦济世抱负。大和二年,杜牧进士及第,当年又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江西团练巡官,转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

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出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周岁，拜中书舍人”（《樊川文集》卷十《自撰墓志铭》）。大中六年十二月卒于中书舍人任，年五十。

杜牧胸怀壮志，颇有匡世济民抱负，故其诗文颇有忧国忧民的干时之篇，这一点在过去一般人中是缺少认识的，多有以风流放浪才子目之者，这实在是耳食之见。其实他的政治抱负前人已有揭橥，如清人吴锡麒在《杜樊川集注序》中即有精要的评说：“牧之内怀经济之略，外骋豪宕之才。当其时，藩镇方张，朝廷多事；五诸侯并起，欲逼天闾；十常侍未除，先惊帝座。屯蜂昼聚，社鼠宵行。江充既兆乱于犬台，贾谊转理忠于鹄舍。往往激昂狂节，摇荡愁旌；陈兵事之书，一麾愿乞；揭《罪言》之目，三刖奚辞。观其《独酌》成谣，《感怀》发咏，固非徒以一己牢愁之语，托之无端绮靡之词者也。而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揽霜毛于春镜，裹雨褐于秋船，茹鲠空忧，叫阍无助。惟是留云梦里，中酒花前，凭街子而说生平，对携菹而论心事。绿叶成阴之慨，青楼薄幸之名；壮志飘萧，才人落魄。此又写深情之帖，莫喻缠绵；读《小雅》之篇，难名悱恻也已。”（见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前附）《新唐书》本传称“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少与李甘、李中敏、宋刖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旧唐书》本传亦赞“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前人这些赞誉之辞并非虚语，我们仅举几个事例即可印证。杜牧二十馀岁尚未出仕时游同州澄城县，即写下了反映民生疾苦的《同州澄城

县工仓户尉厅壁记》，指出：“嗟乎！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堕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险而不恃法，则划土者宜乎墙山湮河而自守矣，燕、赵之盗，复何可多怪乎？”（《樊川文集》卷十）大和元年李同捷反叛，朝廷出兵讨伐，杜牧作《感怀诗》抒发感慨与志向，中云“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荡荡乾坤大，曈曈日月明。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尝争。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出仕后，他更为关注国家大事，作有《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名篇，直陈唐历朝与当世得失，提出治国治兵方略。其卓杰之见，为《资治通鉴》所采录。诗人也敢于追究前朝君主之非，其《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揭露与讥刺是何等辛辣，可见诗人的愤慨之情。会昌二年八月，回鹘乌介可汗率众入侵，朝廷发兵抗御，时杜牧在偏僻的黄州任刺史，慨然而作《郡斋书怀》，抒发感愤云：“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又有《郡斋独酌》诗吐露自己的报国壮志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又赋《早雁》诗：“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菇米岸莓苔。”表现了诗人对于因回鹘入侵而流离失所的边地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这些诗文均可显露诗人的匡世报国情怀。这种情怀即使在他自感受到排挤而远守小郡时也是如此。会昌年间，李德裕主政，杜牧自认

为受到李党的排挤而外任,尽管时有牢骚,但他仍然关注时事,作《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江贼书》,热心向李德裕建言献策,为解除内忧外患而尽心尽力,显示了一片赤诚报国之心。

杜牧为人刚直敢言,富有正义感。他厌恶谄媚取容,趋炎附势。当权奸当朝,宦官跋扈,正直之士如李甘、李中敏受到打击排斥陷害时,杜牧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作《李甘诗》、《李给事二首》、《哭李给事中敏》等诗赞扬他们的气节,对权奸的胡作非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恨。

不可讳言,杜牧的诗文中也有他的消极情绪乃至风流放荡的成份,尤其其诗歌为如此。如在他自认为因自己刚直敢言而受到排挤时,在《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中即言:“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自遣》云:“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馀。且抽持板手,却展小年书。”《大雨行》叹老悲伤云:“今年鬲草鬓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而其《遣怀》、《兵部尚书席上作》等诗,正如缪钺先生所说“也都表现了他的不羁之行、声色之好”(《樊川诗集注·前言》)。不过这种诗文毕竟不多,不能以偏概全,以瑕掩瑜。

二

杜牧尽管不以文论家称,但他也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值得重视。他《答庄充书》的这段话是颇有见地的:“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风,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闾阖，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这里杜牧强调了“意”在文章中的首脑关键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应该说这样的主张是画龙点睛之见，同时又颇为圆融全面。本着这种见解，尽管他在《李贺集序》中高度地评价了李贺诗歌在诗歌艺术表现技巧上的成就，但对于他诗歌的内容仍有不足之憾：“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同样也是强调了“理”在文中的主脑地位，故他对于那些有违于“理”，乃至于在他看来不合“仁义”标准，不够健康的“纤艳不逞”的诗歌进行无情的谴责，以此他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一方面称赞李戡“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同时借李戡之口批评了元、白某些“纤艳不逞”的诗歌，云：“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这一对于元、白诗歌的批评，后人所见不一，议论纷纷，甚至有反唇相讥者。平心而论，杜牧借李戡之口对于元稹、白居易某些诗歌的批评，尽管过于激烈，甚至偏激，但是如果以杜牧主张的诗文应以理为主，讲究仁义教化功用，则这一段批评仍然不失为击中元、白某些艳体之作的要害。

杜牧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曾有所表白：“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樊川文集》卷十

六《献诗启》)实际上,杜牧的诗文创作大都是颇为“苦心”而“求高绝”的,因此无论诗、文、赋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人对于杜牧诗文也颇为推崇,以致有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之称。

三

杜牧现存的赋有三篇,其中尤以《阿房宫赋》为著名。据《唐摭言·公荐》所载太学博士吴武陵即极为欣赏杜牧这篇赋,并极力推荐给主持进士科考试的礼部侍郎崔郾,杜牧遂因此及第。此赋不仅末尾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段之精彩的警世之言为人所激赏,就是“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回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一节,对于秦宫人的描摹也极为细腻传神,其妍姿丽容、翘盼望幸之神态仿佛可见。即是他的另一篇《晚晴赋》,对于红菱的刻划也颇可见其赋笔之精彩:“复引舟于深湾,忽八九之红菱,姘然如妇,敛然如女,堕蕊颦颜,似见放弃。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窥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

前人极为推崇杜牧的诗歌,诚如翁方刚所评:“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后,未见其比。其笔力回斡处亦与王龙标、李东川相视而笑。‘少陵无人谪仙死’,竟不意又见此人。只如‘今日鬢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直自

开、宝以后百馀年无人能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后，亦更不能道矣。此真悟彻汉魏六朝之底蕴者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前人常以“俊爽”、“宕而丽”、“雄杰”、“豪健”、“寓少拗峭”、“雄姿英发”等语品评杜牧诗。这些评语，我们可以归纳为俊爽峭丽，雄健劲迈。他的有些诗歌风格上偏重于俊爽峭丽，有的则以雄豪劲健见其神采，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神采飞扬，气势不凡，给人生气勃勃的超拔之感。这一类诗歌如其《长安秋望》一绝即如此：“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又如七律《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此诗诚如潘德舆所称“竟体超拔，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虽感慨系之，但又豪爽洒脱；虽不无颓放之意，但骨子里则愤激不平，英雄之气仍存。诗写到如此挥洒自如感慨万千，真可称“小杜最佳之作”（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本诗下引吴评）。

总体看来，杜牧的诗歌尤以七律七绝为精彩，其诗俊爽清丽，流情感慨，此诚如缪钺先生所说：“独能于拗折峭健之中，有风华流美之致，气势豪宕而又情韵缠绵，把两种相反的好处结合起来。”（《樊川诗集注·前言》）如《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早雁》、《洛阳长句》、《九日齐山登高》、《寄扬州韩绰判官》、《题禅院》、《江南春绝句》、《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以及《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皆如此风调。这也是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引徐献忠说：“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持拗峭。”

其七绝多有名篇，被翁方刚推崇为“直自开宝以后百余年无人能道”（《石洲诗话》卷二）。其特色在于常是托兴幽微，远韵远神，雋永优美，富有情韵，而又显得玲珑剔透，雋妙天成，蕴藉含蓄，如《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又如《题禅院》诗：“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还如《郑瓘协律》诗：“广文遗韵留樽散，鸡犬图书共一船。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此外像《泊秦淮》、《江南春绝句》、《题桃花夫人庙》、《题村舍》、《山行》、《齐安郡中偶题二首》之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等等皆是。这类诗不仅富有盛唐绝句的含蓄蕴藉、风调流美之致，而且立意惊警，写景言情，饶有韵致，显出一片杜牧特有的风情神采。

当然杜牧律诗绝句可称者还很多，此不一一。这里还想说说他的咏史之作。杜牧的咏史诗多为以议论惊警见长的七绝如《题商山四皓庙一绝》、《云梦泽》、《题乌江亭》、《赤壁》等。这类诗作虽说好议论，然常带情韵以行，故别有意蕴风味又喜用翻案法，以此寄寓诗人特出的识见。此正如清人赵翼所论：“杜牧之作诗，……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瓠北诗话》卷十一《杜牧诗》）其好处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非浅识所到”（谢枋得《叠山先生注解章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卷三）。又可以收到跌入一层，正意益醒之效。不过也容易引来后人的误解。如宋人许颢谓：“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塗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彦周诗话》）其实这是误解了杜牧诗意，故清人薛雪《一瓢诗话》驳云：“樊川‘东风不

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妙绝千古。言公瑾军功止借东风之力，苟非乘风力之便，以破曹公，则二乔亦将被虏，贮之铜雀台上。‘春深’二字，下得无赖，正是诗人调笑妙语。许彦周谓：‘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塗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此老专一说梦，不禁齿冷。”同样的宋人胡仔也批评杜牧谓“至《题乌江亭》，则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杜牧之》）。所批评的只是就其“好异而畔于理”，但杜牧诗的真正意蕴却不在于此。应该说，他的咏史诗在立意上是颇有创意的，表现了他的独到见识；而其好议论的特色，对于后来的咏史之作也产生影响。

杜牧是晚唐承继韩愈古文传统的优秀散文家，他不仅在语言上坚持用散体，而且在理论和创作上也秉持古文运动的主张，他的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论文，如《战论》、《守论》、《罪言》、《原十六卫》等，均是纵论国家政治、军事、社会民生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或弊病，表现了他的‘辅国救世’的理想抱负，而且所论切中时弊，见解深刻，语言明白晓畅，故多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采录。类此的文章尚有《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上昭义刘司徒书》、《上宣州高大夫书》、《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等等。他的散文多是有感而发，以议论见长，条分缕析，寓意深刻，纵横奥衍，诚如其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所评：“窃观仲舅之文，高骋复厉，旁绍曲摭，絜筒浑圆，劲出横贯，涤濯滓穢，支立欹倚。呵摩皴痂，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断果行，若誓牧野，前无有敌。其正视严听，前衡后鉴，如整冠裳，祇谒宗庙。其聒蛰爆聋，发不栗，若大吕劲鸣，洪钟横撞，撑裂啞唇，憂切《韶》《濩》。其砭熨嫉害，堤障初终，若濡槁于未焚，膏痍于未

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乱，变醜养瘠，尧醜舜薰，斯有意趋贾、马、刘、班之藩墙者邪。”裴延翰亲炙于杜牧，自小即受到杜牧的“率承道诱”，杜牧“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硕黻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樊川文集序》）。他对杜牧文的评价应该是中肯可信的。

四

杜牧于大中五年冬得病将卒前，嘱托其甥裴延翰为他编文集，因此《樊川集》二十卷即是裴延翰遵杜牧之嘱而编成的，这些诗文多是可靠的。但是宋人又搜罗有《樊川别集》和《樊川外集》各一卷，今存《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即附有《樊川别集》和《樊川外集》。南宋时又有据传是杜牧的《续别集》三卷，但当时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中即指出“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是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续别集》今已不见，但《全唐诗》卷五二六所收的杜牧诗大致即是来源于《续别集》。清人冯集梧著《樊川诗集注》即将《全唐诗》此卷诗校补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并另辑有《樊川诗补遗》，然上述两部分诗作不仅多有伪作，而且《樊川诗补遗》也有已见于《全唐诗》者。今存杜牧较好的集子尚有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乃清杨守敬使书手就日本枫山官库中藏本影摹，其中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又有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下简称“夹注”），乃明正统五年朝鲜全罗道锦山刻本，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卷末有“正统五年六月日全罗道锦山开刊”牌记一行。牌记后为郑方坤跋，云：“小杜诗古称可法，而善本甚罕，世所有者，字多鱼鲁，学者病之。今监司权公克和与经历李君蓄议之，

符下知锦山郡事李君頼令详校前本之讹谬而刊之,始于庚申三月,历数月而告成。”此朝鲜刻本弥足珍贵,然以前在中土很难见到,故前人整理《樊川文集》时多未寓目,因而在校勘、注释中未能加以利用。这个朝鲜刻本何人所著今不能明,然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四谓“当为南宋人也”。由于夹注本注释与刊刻年代均较早,又至今尚少有人见到,因此它不仅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对杜牧诗文的笺注和校勘尤其具有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即稍加说明。

比如杨贵妃赐死马嵬驿的记载尤为人所关注,可惜常见的资料多过于简略。但是,夹注本卷二《华清宫三十韵》诗中“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句下注引《翰府名谈·玄宗遗录》的一段近千字的记载,即对杨贵妃赐死及其前后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记叙,其细节多有常见资料所未及者,对于研究马嵬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夹注本所引的《翰府名谈》乃北宋刘斧所撰,此书已佚,今存于曾慥《类说》与《永乐大典》中的十馀条,亦无上所引的《玄宗遗录》这一记载。据韩锡铎先生所推测,《玄宗遗录》可能是今已佚的“唐代陆贽撰的《玄宗编遗录》”(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所复制的《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书前的《影印说明》)。如果所言大致不误,则这一仅存的有关杨贵妃之死的详细记载因作者乃中唐人,其时代离马嵬事件不远,它的文献价值也就更为珍贵了。夹注本为杜牧诗注释又远早于清人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下简称“冯注”),且刊于明正统五年,因此夹注本无论在杜牧诗的校、注上,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杜牧诗的校勘上尤有助益。杜牧的《樊川文集》现存的重要本子主要有《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下简称“丛刊本”)、景苏园影宋本以及冯注本等。上述诸本在文字上时有异同,以前校勘杜牧集乃以上述诸本校勘,而未及夹注本。冯集梧在《樊川诗集注》中也未提及,

更未利用夹注本,这在杜牧诗文的校勘乃至注释上未免有所欠缺。尽管夹注本在文字上鲁鱼亥豕的讹误也不少,但是由于它成书于宋代,刊刻于明正统间,因此无论如何它在校勘杜牧集时仍是重要的参校本。

我们不妨举些例子将夹注本与冯注本等较好的本子相对照。冯本《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诗“国号大梁公”下有“原注:太尉季弟司徒德,亦封梁国公”。冯注接着辩“德”为“听”之误,并说“第各本皆同,亦仍之”。其实冯注所说各本皆同有误,其所未见的夹注本即正确地作“司徒听”。又冯注本《樊川外集》中《倡楼戏赠》诗前二句:“细柳桥边深半春,颭衣帘里动香尘。”丛刊本同。然检夹注本,首句则作“细柳桥边探半春”。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探春》条:“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据此,夹注本的“探半春”恐优于冯注本的“深半春”。又如《樊川外集》中的《遣怀》诗,诸本其第三句均作“十年一觉扬州梦”,而夹注本于“十年”下注“一作三年”;又引《太平广记》中有关杜牧为牛僧孺扬州幕掌书记时游扬州的记载,其中杜牧所作本诗亦作“三年一觉扬州梦”。考之于杜牧生平行踪,以及此诗文本出现的先后,“三年”当较“十年”准确。至于诗歌字句的不同,则夹注本与诸本多有之,尽管有些文字夹注本未必胜于它本,但其中不少还是颇有校勘价值的,在杜牧诗集的校勘上,夹注本是不可忽略的。

另外,在杜牧诗歌的注释上夹注本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价值。杜牧诗在清代有冯集梧注,这一注本是日前对《樊川文集》前四卷诗的最好注本。夹注本的注释虽整体上恐怕比不上冯注本之注释,但也有不能忽视的优于冯注之处。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夹注本注释了《樊川文集》第一卷中的《阿房宫赋》、《望故园